

奉贤文史资料

(15)

奉贤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1、一贯道及其在奉贤被取缔梗概

姜福庆整理

2、闯关

金利生

3、到浙东敌后打游击

——忆抗日战争时期随五支四大去浙东前后 陈友新

一贯道及其在奉贤被取缔梗概

姜福庆整理

一贯道是奉贤的一个主要反动会道门组织。特点是参加人员多、涉及面广，活动频繁。解放后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打击了一批进行现行破坏的一贯道头目和钻进一贯道内隐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年春，在全国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中，又处理了一批抗拒登记、继续从事造谣破坏的一贯道骨干分子；以后结合统购统销、合作化等运动，每年进行复查处理一贯道的复辟分子，直至1958年后，才销声匿迹。8年中，彻底摧毁了一贯道组织，依法给其中的道首和进行破坏活动的一贯道分子以沉重打击。据统计，全县共取缔一贯道徒3100余名，其中有点传师39名（含外县、市来奉贤的点传师13名），坛主162名，扶乩（三才）及办道人员54名；共拘捕处理了53名，管制13名。

一、一贯道是个没有“道统”的大杂烩

一贯道正式成名于清朝光绪年间。当时山东济宁县路中一接掌“东震堂”后，见信徒无几，于是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语改名为“一贯道”，以图正名扩展。路为欺骗群众，还编了一套迷信邪说，把我们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史，划分为“三期”：一是青阳期，指伏羲到周期；二是红阳期，指老子到清朝；三是白阳期，指从路自己开始，自称“弥勒佛下凡，一贯道十七祖，白阳初祖”等。

为了说明路是“十七祖”，还胡编一贯道初祖是达摩（菩提多罗湖成佛化身）、二祖姬神光（燃灯道人转世）、三祖余僧灿（灵宝天尊下凡）、四祖司马道信（封灵宝天皇）、五祖张弘忍（玉帝金童下凡）、六祖卢慧能（地藏王转世）、七祖白玉蟾、马瑞阳（封南岳大帝）、八祖罗蔚祥（称马鸣善老）、九祖贾德辉（称太上高尊远真人）、十祖吴紫祥（封文昌帝君）、十一祖何若道（封三十姆天尊）、十二祖袁志谦（元始天尊下凡）、十三祖徐还无、杨还虚（弥勒佛转世）、十四祖姚鹤天（南海瑞池金母下凡）、十五祖王觉一（水精子、北海老人、东振堂创始人）、十六祖刘清虚（太极真人下凡）、十七祖路中一自己。

1925年路中一死后，传给弟子张光壁(张天然)，自称“济公下凡”是一贯道的“十八祖”。从此，张继承衣钵，传道于济南。1930年在济南建立“中枢坛(总佛堂)及金刚、敦仁、礼化、天一四大坛，向全国各地发展。抗日战争开始后，张投靠日伪，充当汪伪政府的外交顾问。大汉奸褚民谊、周佛海等也成了一贯道弟子；日本特务头子头山满提出“万教归一”，一贯道成了万教之首，名声大振，公开传道，大肆宣传不抵抗主义，参与屠杀抗日军民。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下令取缔一贯道，但张即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改一贯道为“中华道法慈善会”，继续公开扩张，最终成为流传最广、势力最大、活动最突出、危害最严重的一个反动会道门组织。

1947年9月29日张光壁死后，该道分为两派、一为以张妻刘率贞、子张英誉为首的“明线”师兄派；一为以张妾孙素珍为首的“暗线”师母派。嗣后，明为张之死而“守道三年”，实则两派激烈地争人夺地，加之中国正处在两种命运的决战阶段，两派的活动更为猖獗。

一贯道的别名多得吓人，有七、八十种，除上面提到的外，还有什么孔孟圣道、孔圣道、孔明道、孔孟圣教、济公道、无极老母道、观音道、天仙道、罗汉教、老母会、真谛教、白阳教、红灯教、大刀队、三教门、一门道、三教合一、还乡道、昆仑道、中庸道、天元堂、三化堂、东华堂、明德佛堂、崇化善社、近贤道、蟠桃莲社等等，不胜枚举。

一贯道的信仰也多变、相互矛盾。他们自称“古圣相传”以“无极老母”为最高神。实际上是一贯地恭奉的从伏羲、神农、轩辕到尧、舜、禹、汤；从文武周公到老子、孔子、孟子；从无极老母、弥勒佛、南阳古佛、南极仙翁、吕洞宾、释迦牟尼、观音菩萨，济公活佛到关羽、岳飞、耶稣、穆罕默德等等。其中不少“古圣”是风马牛不相干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派系。戴上这么多的“桂冠”，目的是极据各地风俗习惯、封建迷信特点，各取所需地宣传、发展。

一贯道的组织系统、称谓、活动方式也各行其是。在路中一之前称“活佛”、“主谏”、“点道师”等等，路中一收一贯道后，称“师祖”、“点传师”、“道长”等；张光壁接道后，称“师尊”

(师母)、“道长”、“点传师”、“坛主”、“道亲”，办道人员有文牒乩手(三才)等。在张光壁时期的主要活动形式有：1、开坛：指全坛性集会、讲道。2、入道：新道徒入道仪式。3、传“三宝”：一是“点玄关”，将来死后直升理天；二是传口诀，即传“无太弥勒佛”五字真经，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三是教“合同”，是教念经的姿态。4、扶乩：由天才、地才、人才“三才”根据道首的旨意，在沙盘里胡乱划出意思，作为“神旨”来愚弄道徒。5、立愿：有口素愿，忏悔愿，求道愿、领命愿等等是一种道徒誓言，否则要遭“五雷轰身”。6、开班：不定期地举办集训和训练班，除灌输道首的旨意外，目的要道徒捐钱献物，是攫取财物的手段。他们的组织、称谓、活动形式很凌乱，如有正式坛、也有家庭坛；把乩手叫“三才”；把“三宝”叫“渡大仙”；把“扶乩”说成“开盘”，甚至更加荒唐的是要妇女立“清修愿”，不与丈夫同房；立“献身愿”，任凭道首奸淫等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把戏。

二、一贯道在奉贤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

奉贤一贯道组织是1949年春开始传入的。逐渐发展成为五大系统：

一是南桥系统：1944年1月，由松江一贯道朝元坛“点传师”骆新金通过在南桥的绍兴同乡发展起来的，后被上海总坛夺取领导权，派点传师张福全和提升点传师王福生领导，先后建“天铎坛”、“天齐坛”、“天知坛”、“天德坛”、“天真坛”、“天基坛”等11只坛，涉及江海、新寺、齐贤、青村等地，道徒1600余人。

二是新寺系统：新寺一贯道“天妙坛”、“天老坛”、“天一坛”、“天归坛”等原属南桥系统。1948年坛主陈大宝见上面无布置活动，便去松江“朝元坛”接头，由点传师王德仁来新寺领导，并向钱桥等周围发展，建坛16只，道徒400余人。

三是庄行系统：1944年春，上海“基础坛”点传师吴凤鸣回庄行家中，在亲戚、朋友、同学中传道，先后在庄行、邬桥地区建“恒德坛”、“美德坛”、“弘德坛”、“华德坛”等10只坛，道徒500余人。

四是奉城系统：1944年夏，奉城张兰芬在南汇大团参加一贯道后，引来了大团、新场的点传师冯晟等四、五人，道步在奉城、平安、头桥、四团地区发展，先后建“昭德坛”、“康德坛”、“秉德坛”、“和德坛”、“良德坛”等7只坛，道徒400余人。

五是西渡系统：1944年夏，闵行一贯道“祥光坛”点传师瞿欧宝到西渡传道，先后以西渡为中心，发展邬桥、金汇周围地区，建立“普光坛”、“慎光坛”、“正光坛”等6只坛，道徒300余人。

此外，还有属外县领导的零星小坛和家庭坛。

由于一贯道在日伪、国民党政府时期两次公开传道，所以发展快，成员复杂。虽然绝大多数是封建迷信的善男信女，但鱼目混珠，钻进不少地痞流氓，地主恶霸，失意政客等等，加之一贯道没有团定的道统、道规，活动不一致，方法不一样，因而道首们可以随心所欲，诈取钱财，治病害人，奸淫妇女等罪恶比比皆是，极尽其造谣破坏之能事。计有：有以下八种：

1、“三宝的神威”。传“三宝”是一贯道骗人的核心把戏，其中尤以把传“无太弥勒佛”五字真经吹得神乎其神。他们在日寇侵占时期，说什么“就是被日本皇军捉去了，只要一念‘五字真经’，他们就会乖乖地放你。平时碰到天灾人祸时，只要一念‘无太弥勒佛’，就能水淹不湿，火烧不着，安然无恙。遭到‘魔考’时，只要一念‘五字真经’，解放先生们就会像木头人一样，动弹不得。总之，“三宝”不仅能保证死后上天堂，活着也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2、“三期末劫过了，弥勒佛当家。”一贯道的头头们针对解放战争摧枯拉朽之势，大肆宣扬“三期末劫到了”，煞有介事的说：“青阳有九个劫，红阳三九二十七个劫，白阳是九九八十一个劫，现在三期末劫快到了，老百姓要遭受大劫大难，只有人道才能渡过劫难”。还编了一个“石洞显灵”的故事说：“有个地方出了一只石笋，石笋下西有个石洞，有人进去一看，显面有九间房子、一个老太，三付香烛：一付烧完、一付刚燃、一付没动。这三付香烛代表蒋介石的已烧完，毛泽东的刚燃，没有动的是弥勒佛，所以最后

原
书
缺
页

对各教门都不相信；魔鬼要考道，我佬要有准备，过了黑暗就迈到归一大道。”“解放军的帽徽是‘八一’，就是说八魔考一贯道，你们要经得起魔考，听候命令，到时大干一场。”并要道徒写“永不叛道”的保证书，让道徒坚持顽抗到底。

7、“抗美援朝是劫数。”一贯道在破坏抗美援朝运动中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开始时五魔捣中原，赶走了口上口（指日本的日字），来了天上天（指美国的美字）。美国有原子弹，中国一定要灭亡的。抗美援朝是在劫在数，劫数难逃，去充当炮灰。”中国海洋完全被美国封锁，四周筑起飞机场。美国的对头不是中国，对中国不放在心上，没有什么打头；最恨是苏俄。苏俄说不侵略，实际把我佬东三省的重机都带走。结局是“两马跨过黑江河。”蒋介石勾结马歇尔从黑河跨过鸭绿江来侵略，毛泽东勾结马林科夫从黑龙江过来侵略。“中国人劫数难逃。”

8、“幽灵难散”。一贯道在大张旗鼓被取缔后，绝大多数信徒提高思想，知错即改，一刀两断。但也有幽灵不散，继续进行造谣破坏等复辟活动的。从复查中发现有：1、不交道产道具，将佛堂搬到阁楼上，平时坚持吃素，逢年过节早晨起来上香拜佛。2、有的转信耶稣、天主、佛教，其中多数是封建迷信的善男信女，个别是隐藏在合法的教会中，继续散发着一贯道的毒素。3、继续迷信造谣，如“闰八月，人头乱，百合饭能解劫。”“统购统销是劫数，用黑大枣、黑豆、黑芝麻、大麻花、糯米粉等九蒸九晒，做成救饥丸，不饿丹，吃后能解劫。”“除虫是除不尽的，孟老爷有五箱虫，只放出两箱，这是天意，越捉越多。只有念真经，做小黄旗一插，虫就飞掉了。”这些荒诞无稽的笑话，当时把人们思想搞乱，劳民伤财，严重影响农村工作的开展，这些谣言都是一贯道小头目及死硬分子撒布的。

三、取缔反动会道门政策及奉贤执行情况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一贯道列为反动会道门之首，坚决予以取缔，这是帽提一贯道组织性质和现实危害决定的。早在建国前，我八路军、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政府就给破坏抗日、解放战

争、危害人民政权的反动会道门活动迎头痛击。1949年1月华北人民政府曾专门颁发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布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颁发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将反动会道门头目列为重点打击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之一。对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总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主要精神有三点：

一是，对于阴谋组织叛乱、造谣惑众、诈骗钱财、奸淫女妇等作恶多端的道首和隐藏在会道门中的反革命分子，以及登记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坚决予以惩办；对那些罪恶不是很大的道首，如能幡然悔改，坦白认罪并有检举立功表现者，予以宽大处理。

二是，对一般小道首、办道人员，他们虽是积极执行者，但只要登记悔过，交待组织关系，交出武器、道产，退道及有积极表现者，均予宽大处理。反之，隐瞒组织，疏散道产、毁灭罪证，继续破坏活动的，同样依法严办，绝不宽恕。

三是，对一般道徒，只要他们公开登记、声明退道、脱离组织，停止活动，即不予追究，也不歧视。

根据国家法律，党的政策，我们县整个取缔一贯道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严厉打击破坏运动的一贯道坛主以上的道首和隐藏在一贯道中的反革命分子。如有一个大流氓、恶霸，解放初钻在一贯道中培植势力，勾结现行匪特企图与匪首黄八妹联系，妄图进行颠覆活动，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依法枪决。与此同时从审查现行破坏活动的一贯道道首着手，揪出一个头取缔一批道徒。这一阶段取缔一贯道徒700余人，其中拘捕点传师11名（含外地处理8名），坛主13名，“三才”等办道人员7名，管制4名。

第二阶段：1953年春，全国规模的大张旗鼓地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我县根据江苏省、松江专署的部署，先试点后全面，先调查摸底后宣传教育，先登记取缔后依法处理的步骤，逐步掀起大张旗鼓地取缔高潮。这一阶段虽然声势浩大取缔人员多，但由于宣传教

育深，绝大多数一贯道徒“闻风而动”，自动报名登记，交待组织关系，交出道产道具，均得到宽大处理。只有个别的道首拒绝登记，毁灭罪证，破坏运动或群众检举出有其它历史罪恶而被依法处理。这个阶段共取缔一贯道徒2100余人，其中拘捕点传师8名，坛主2名，办道人员2名，管制3名。

第三阶段：自大取缔后至1958年，主要是结合统购统销、合作化、肃反扫残运动，采取从谣言中复查，从谣言中追根等“露头就查”的方法，进行取缔。如当时有一个村不少人反对合作化、统购统销，说“这是共产党一步一步收紧，现在开始革穷人的命了。”经追查是这个村一贯道的坛主所为，于是进行取缔。1956年，经群众检举揭发，政府追查，有1名点传师，3名坛主等向政府登记退道。这一阶段共取缔一贯道徒200余人，其中拘捕点传师5名（含外地处理4名），坛主2名，管制6名。

经过长达8年对一贯道的打击取缔斗争，群众和道徒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对一贯道的反动性也有了本质的认识，再也不会轻易受骗上当了。他们有的说：“一贯道是十七、八爷（道祖）养出来的，戴了七、八十顶帽子（别名）有奶便是娘，见佛就拜，不是佛也拜的乱七八帽组织。”有的说：“一贯道实际是多贯道，杂种道。”也有的说：“一贯道实际是一惯害人道，造谣公司，政府取缔的好。”从此，一贯道的活动，消声匿迹，再也没有在奉贤发现过。

闻 · 关

金 利 生

上海解放前夕，接管松江地区9个县的中共松浦工委，曾经向坚持在奉南川一带进行敌后武装斗争的浦东人民解放总队作过一项重要指示。我受命拒任了这一次的特别信使。在执行这次任务中，曾得到了中共南桥支部地下组织的密切配合。往事虽已40余年，至今仍记忆犹新。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天凌晨，百万雄师突破了长江天险，作二梯队的松浦工委，在当晚由苏北的八圩港到了江阴。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先头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了苏、锡、常各地的国民党守军，二梯队亦紧跟着向腹地深入，经无锡东进，26日深夜，到达了苏州西郊，宿营在枫桥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27日拂晓，工委公安大队侦察科长邱力斧（现名钱习之）同志找我个别谈话说：“你把军服脱下，背包交后勤保管，我们立即到城里去。”当时，领导上早已明确纪律，为了维护苏州的新秩序，不属于市军管会的成员一律不得随意进入市区。眼前，领导要我进城，显然有什么任务，但我仍禁不住问了一句：“去办什么事？”

邱科长说：“去找赵政委，你现在什么也别问。”赵政委是赵一德同志，工委公安大队领导，曾任东南地区的政委，对工作要求很严，对同志却很体贴，平易近人，同志们出于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习惯地称呼他政委，去找赵政委，我意识到这一次的任务不寻常。于是，悄悄地离开了驻地。

9时左右，我们在苏州道前街原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内找到了赵一德同志，他正和工委的领导、原地委书记周一峰同志在商量着什么事。周、赵两位同志，面容清瘦，深深留下了战火与风霜的烙印。

待我们坐定后，周一峰同志向我交代了任务，要我先行出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去向浦东人民解放总队传达工委的指示。他逐字逐句地向我口授了内容，要我默记心头，一字不差复述给他听一遍以后，再密写在一本学术杂志里带在身边，指示的内容是：我9、10两个兵团分别沿宁、沪、杭两线积极向上海推进，解放大上海的战斗即将打响，我强兵压境，敌军只有吴淞口一个狭窄的港口是逃窜海岛之路，在此情况下，势必作垂死挣扎，工委要求浦东总队注意掌握以下几点：1、尽力避免与敌军主力冲突，以防不必要的损失；2、积极筹备军粮，保证我大部队进攻上海所需；3、广泛发动群众护路护桥，确保我军顺利进军；4、我军到达后，主动当好向导；5、

大军过境后注意搜捕敌人残兵游勇及暗藏敌特，以防其骚扰群众。赵一德同志对我说：“这一次派了一个侦察员去担任通讯兵，相信是能胜任的。”接着又作了一些具体交代。从指示的内容和政委的讲话中，我捕出了这一次任务的份量，浦东总队的一举一动和其带来的后果如何，都系在我的身上了。

下午2时，我随邱力斧同志到了怡随。这里有一个小伙子在等着我们。邱给我们作了介绍：“这是朱墨同志，苏州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你俩现在的务份是同学、同乡，此次同路回上海去。”我明白了，他将是寻找浦东总队的向导。朱墨长得挺秀气，看上去很机灵，大约十七、八岁，颇令人有好感。除此以外，我对他一无所知，过了两年后，因工作之机再次相见时才知道，他当时是南桥支部的地下党员。这个支部很活跃，既搞学运和社会工作。又积极配合着浦东总队的武装斗争。这一次朱墨在苏州，是颇复生、吕炳奎同志（在上海外围坚持敌后斗争的领导，松江专署第一任专员和副专员）指令他在此守候待命的。当然，朱墨也只知道我的姓名和这一次去浦东总队传达上级指示，其它情况他什么也不知道。长期来，大家都从事地下工作，养成了严守机密的好习惯，相互间都不随便串联、探问各自的事情。当时，我们只就如何行动作了研究，考虑到顺着沪宁线去浦东，预计二、三天可以到达，但是沿线敌军封锁重重，搜查很严，走这一条路要冒很大风险；另一条是从小路南下，横渡淀山湖，经闵行去浦南，绕道而行需要四、五天。为了安全计，我们商定了从水路绕道南下。

方案已定，邱力斧同志紧紧握住了我们的手说：“谨慎从事，愿早日在松江相见。”他的一番话，语重心长。我们盘算一番，一定尽快顺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万一有所不测，只能牺牲自己，决不泄密，更不能暴露浦东总队。

当晚，我和朱墨在阊门外的旅店内住了一宿。次日浦晨，在万年桥下雇一条小船上了路。谁知刚出发就遭到了意外，近午，船到吴县用直镇，就被我们部队封锁，战士们说，这是为了解放昆山、上海需要。他们言词婉转，无庸置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和

朱墨都傻了，刚刚迈步就丢了船，两只旱鸭子怎么穿越水网地区去浦南，如向战士说明我们的使命，他们不一定会相信，相反却暴露了机密。出子无奈，我们只好弃船上岸。

在用直，我们兜了一个下午，想偷偷雇一条船“溜”走，结果是白费劲，看来，要么改变方案，从陆路到上海，闯它一关，要么沿看水路步行到淀山湖，走一步看一步，但是，这样走法到雇能在哪天才能到浦南，我俩都没把握了，两人心里看实很焦急。

傍晚，我和朱墨找了一家旅店，就近用了晚餐，饭馆里顾客不少，大多是被封了船而耽误了路程的旅客，有的在叹气，有的发牢骚。和我们同桌用餐的是一个三十余岁的中等个儿，北方口音，大家同是过路旅客，就相互攀谈起来，慢慢地竟从陌路相逢到表示友好。由此，我们摸到了这个人的一点底细，此人是敌军营长，都队被我军击溃了，单身从南京来，准备到上海去找他的上司和旧部，经过长途跋涉，已囊中羞涩，狼狈不堪，此人也知道了我们是上海人，因学校停课了，从苏州回上海去。于是，他提议我们明天同行，经昆山到上海，他说，在沪宁线的国民党军队里，他熟人较多，只要找到同事，他就好办了。

我暗自盘算起来，从各方面观察，此人是个行伍出身，不象敌特分子，我和朱墨均未露出过被捉，人家也无从怀疑我们是共产党。同时也考虑到，此人熟悉沿线国民党军队，随其进入上海，还可能成为我们“保护伞”。一个改变行程的主意出现在我的脑海，我向朱墨作了暗示。他反映很灵敏，当即投回一个同意的眼色，于是，我们对此人的提议表示了赞同。这一晚，我们替他付了饭帐又付了房金，这个人很为感动。

当然，对情况的分析判断是一回事，我们也不能不防一看。深夜，我仔细地记下杂志里那张密写指示的页码，以备万一出事故时随即撕下来吞进肚子里去，也和朱墨计议过，傻如在途中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两人对他一个还是可以应付的。

29日，我和朱墨与这个国民党军官摸黑起床登程，8时左右，走近了陆家浜，只见小镇四周金被木栅栏封了起来，小镇出入口留

着一道门，两边有敌军严守着，来往行人经过，都被严密搜查一遍才放行，我和朱墨虽早有思想准备，见到眼前情景，总有点耽心出事放，因此，每向前走一步，心里的一根弦就拉紧一分。当我们靠近敌军警戒50米左右时，同行的那个敌军营长突然向镇上警卫“老王、老李”的喊叫起来，我和朱墨不免一怔，正想这是怎么一回事？猛见得两个警卫的敌军大步朝我们奔过来，我和朱墨立即停步，准备着万一，正在这当口，我们的同路人赶忙迎了上去，他们一边说：“营长你回来了。”另一边说：“你们原来在这儿，真没想到。”接着又向卫兵打了招呼，指指我们说：“他俩是我的朋友，你们照顾他俩上车去上海。”原来这个同路人在这儿碰到了旧部。这也算是巧遇，我们终于借了这个人的光，未受任何阻拦和麻烦，进入了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列车开动前，同路的那位敌军营长专门来车厢里找到我们，还递来了两块银元，很兴奋地说：“我回到了部队，不再陪你们去上海了，这两块钱给你们留着路上用，我们后会有期。”眼前这一切，似乎是一场戏剧，但它是一个现实，我们进入敌区竟是如此顺利，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然两，现在的高兴还是过早了一点。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上海北站一个虎口，这一关又怎么办！

大约两小时以后，列车进入上海，在北站缓缓停下，我和朱墨没有急着下车，在车厢里用心观察了一下月台上的动静，只见整个车站通道全被用木栅栏挡了起来，出口处只留下两到三人挤得过的—道门，两边站着两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宪兵，在逐一枪查着每个出人的身份证。列车到站，成群旅客朝着出口处蜂涌过去。我和朱墨没有市民身份证，只有凭着两人的“学生证”去闯一下了。我俩迅遇交换了一下眼神，瞄准了人流动向，跳下车厢，加紧几步钻进了最密集的放客丛中，随着人潮向出口处涌去。旅客那么多又那么拥挤，迫得敌军应接不暇，查不胜查，我们抓住了这一最佳时机挤到门口，摸出“学生证”朝敌军亮了一亮。在这样的场合，几个敌军真有点象木头人，只有两眼看看旅客和证件，任凭旅客一批一批地从面前挤过去，我们也就此挤出了车站，这时，一根绷紧的心弦

才真正地松弛下来。

当时的上海，真是糟透、乱透了，我们从北站经河南路直到外滩。一路上只见到一伙又一伙“黄牛”，把手里的银元抛得咣咣响，嘴里不停地嚷着：“大头、小头（银元）”。象成群的苍蝇在嗡嗡作响；偶而见到几队巡逻的敌军在马路上走过，都显得有点萎靡不振，脸色沮丧；凡是粮店油店门前，都排着几路纵队的轧户口粮的人群；马路两旁的商店、几乎家家门前都挂着“不惜血本、大减价”的广告，吸引顾客的洋鼓、喇叭，声声震耳，商品也确实便宜，买一套全毛而服只需二枚银元就够了，但所有商店门前都是门可罗雀。我和朱墨哪有心思观赏这一虚浮异常的市场场景，只顾向十六浦走去，也顾不得去吃一顿午餐，摆渡到东昌路后，出高价雇了一辆三轮车，顾着上南路走去。

浦东沿途又是一番景象，这里敌军较多，大都忙于加固火力地堡。这一路，我们也很顺利，下午三时，接近了周浦，想不到又遭到了麻烦，一个守卫在路边的敌军将我们的车拦住了，要我们下车去当筑碉堡的民夫，我们尽量向他求情说好话，敌军还是死死地缠住了我们，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想到了在国民党内有钱能使鬼推磨，于是摸出了两枚大头塞到了敌军手中，只见敌军双眼闪亮，挥挥手连声说：走！走走！我们也就不容客气地继续前进了。

这一晚上9时到10时左右，我们来到了航头附近，朱墨是老浦东了，他熟门熟路地找到了浦东总队的联络站，经过两天的紧张跋涉，回到了自己家中，我们一下子瘫了下来，只想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一下。隔天，我们终于碰到了总队领导吴建功同志，原原本本地向他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两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此后，我和朱墨一直随着浦东总队行动，五月十三日，南汇的守军溃退，当天下午，我们随着浦东总队进入县城。五月十四日，得悉我军79师也在昨天进入了松江，于是告别了相处多日的浦东总队的战友，步行去松江报到。朱墨同志就留在南汇工作。

到浙东敌后打游击

——忆抗日战争时期我随五支四大去浙东前后

陈友新

1940年底前后，我党领导的淞沪游击队第一支队已在浦东广大地区打开局面。支队领导为了扩展武装力量，成立教导队，培训骨干。1941年4月中旬，我服从组织调配与积极分子钱福章（又名钱指江，洪庙乡人）、范金楼（平安乡人）到教导队受训。经过50多天培训，大家进步很快，钱经我介绍入党。受训结束，我被分配到四大二中队任指导员，钱打人汪伪南汇县守望队（1943年夏初，牺牲在余姚临山地区），范被分配在常务中队工作（曾随队去浙东，后因病回家休养）。我们在受训期间获悉日军为了巩固其傀儡政权，在苏南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进行残酷的“清乡”，浦东地区也即将开始，妄图消灭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避免损失，保存力量，部队中已传闻要转移到浙东新区去。

1941年春，日军大举进攻宁波、绍兴等地，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浙东广大地区陷于敌手。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共中央华中局有开展闽浙赣等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意图，路南特委按中央精神，积极组建部队，先后分批去浙东新区开展游击战争。6月15日支队领导令一、四大队各抽一个中队及一个区队，约130人，组成新的五支四大，拟去浙东。这是我党有公开番号第一批到达浙东的部队。由支队教导员蔡群帆、大队副林有璋（又名林达）带队。下设二个中队、一个直属区队。一中队长孙振华，政治指导员夏治行；二中队长林有璋（兼）、政治指导员吴掌林（后改名陈友新）；直属区队长张政。部队整编后在出发前，蔡群帆向全体指战员宣布：1、为了到新区灰色荫蔽，教导员对外改为教官，政治指导员改为中队副，以区别于新四军部队的职称；2、上船渡海注意事项；3、联系信号，白天用旗子联络，夜间用手电筒联络；4、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群众纪律，搞好军民关系。当天傍晚指战员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熟悉的浦东地区，斗志昂扬地在南汇小洼港附近滩涂登上了

3只木帆船，扬帆南驶，船过汇角时，出现了一条大黄鱼由海面跳进船舱的新鲜事，大家新奇而高兴。船过汇角向西航行，到漕泾海面扬帆向南直驶浙江海北。顺风顺水，微风浪低，进行了一次夜行三百里的海上行军。在船上虽有晕感，但没有呕吐。翌日早上七、八点钟，在姚北海面登陆，赤脚下滩步行至宿营地。盐民们已辛勤地进行晒盐劳动，他们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部队进盐民房子。这里与浦东盐场有所不同，盐场均建有盐民的房子，他们以盐场为家。登陆第三天，日军到相公殿一带“扫荡”，鱼肉人民。大队获悉后决定组织伏击，全体战士隐蔽在海塘上，踞高而下，向南监视着敌人的活动，待机出击。约在下午二时，日军在饱餐之后，大摇大摆地拟返回据点，待他们进入有效射程范围内，我机步枪齐鸣，一阵猛烈扫射，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仅在二具日军尸体上各割去了一只手后弃尸逃窜。我们追击时张宝生缴到战利品步枪一支。事后周明（又名周才荣）到庵东侦察敌情从群众中了解到，这次战斗日军伤、亡各八名。这是我们到三北（慈溪、余姚、镇海三县之北，总称为三北）地区打响的第一枪。一周后的一个上午八九点钟，日军又到几乎是同一个地点进行骚扰，我们又组织了一次伏击。两次战斗，我均无伤亡。胜利的消息，传遍了三北大地，名声飞扬，鼓舞了斗志，严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群众看到我们是真正抗日的部队，因而更加拥护我们，不少人送子参军，扩大了我们的部队；同时，我们的活动地区也在逐渐扩大。11月间我因工作需要调回浦东时，游击区已发展到东至镇海县蟹浦，面至上虞县小曹姚港附近，南至道路头、鸣鹤场等广大地区。浦东部队去浙东敌后打游击，为日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这是浦东人民的贡献，也是我们浦东部队重大成就之一。